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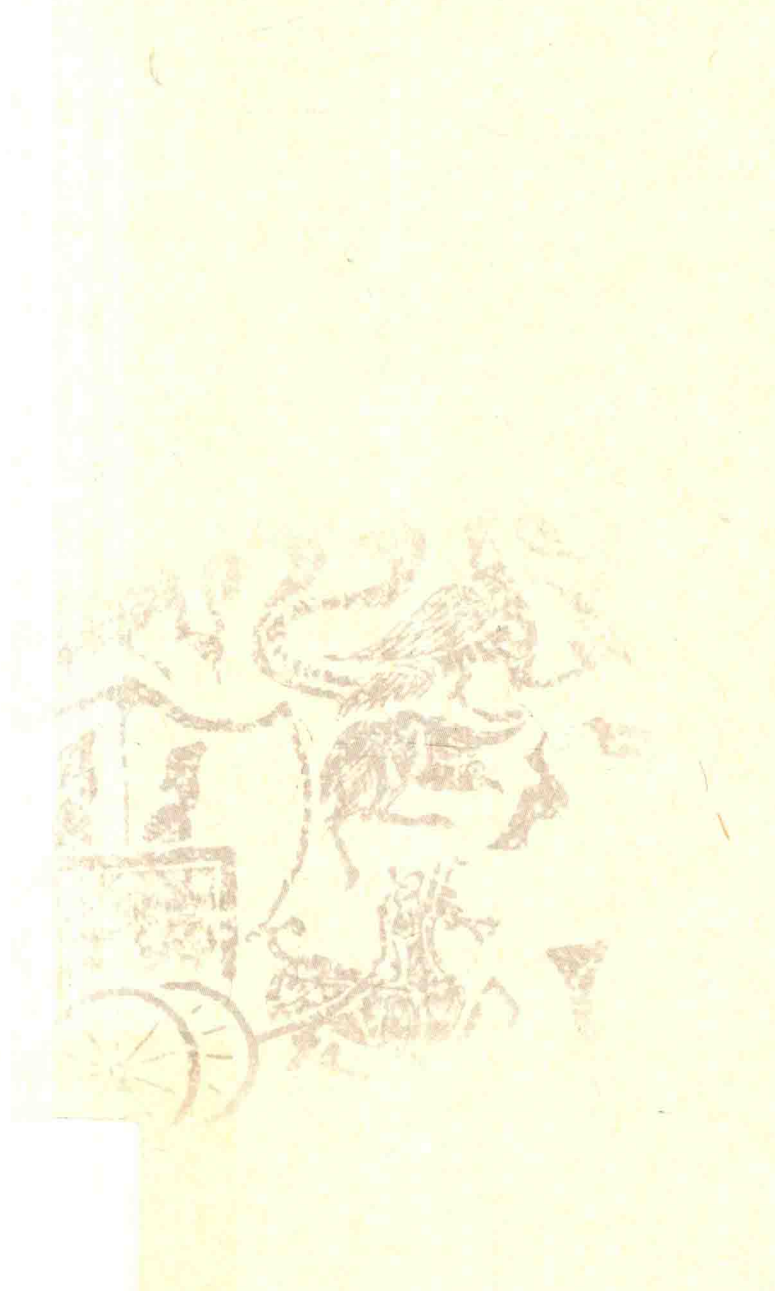
经典  
重读

# 广艺舟双楫 辨析

康有为 原著  
李廷华 辨析



上海书画出版社



经典  
重读

# 广艺舟双楫 辨析

康有为  
原著  
李廷华  
辨析



上海书画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艺舟双楫》辨析 / (清) 康有为原著 ; 李廷华  
辨析. — 上海 :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7.12  
(经典重读系列)

ISBN 978-7-5479-1642-1

I. ①广… II. ①康… ②李… III. ①书法理论—中  
国—清代②《广艺舟双楫》—研究 IV. ①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4253号

---

经典重读系列

## 《广艺舟双楫》辨析

康有为 原著 李廷华 辨析

---

责任编辑	王晓光
审 读	雍 琦
责任校对	朱 慧
封面设计	王 峥
技术编辑	顾 杰

---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ewen.co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ph@163.com

印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25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5479-1642-1

定价 50.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 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书画艺术源远流长，作为华夏灿烂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发展至今仍发射着熠熠光芒。技道同进、艺理并存，中国古代书法绘画理论早在上古即已发轫。先秦诸子学说中不乏广义的美学范畴的精言妙语，虽多片言只语，但却开启乃至奠基了后世中国人的审美与创作思想，这其中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国传统艺术相关的概念阐发与理论观照。秦汉以降，伴随着绘画的成熟和书法的自觉，文人士大夫艺术家对书画理论的阐述不绝于史，于是有了独立的系统性的理论著述，并随着时代的演进，论书画由札记、诗文、题跋等形式发展成论文论著等系统性文献。到了明清民初，更是理论家迭出、名著名篇不断。回望古代艺术史，除了绚丽丰富的书画作品宝库之外，另一道亮丽的风景则是艺术哲思的长廊，古代经典论艺名著让今人从更理性更思辨的立场和方法来探讨和研究中国悠久的书画传统和艺术思想。

艺术理论与创作本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创作是批评、研究的基础和对象，理论、批评反过来指导和启迪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与意念诉求。20世纪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东西融合，当代艺术理论有了不同于前人的全新视野、观念参照和研究方式，更有世纪大发现，如20世纪初三大发现之殷墟卜辞、敦煌藏经、古代简帛等，都以前人未见或少见的重要遗存，为传统理论带来巨大的新认识，有的甚至具有颠覆意义，许多史上谜团因之而解，不少“定论”因之而改。毫无疑问，当今研究者比古代学者拥有更优越的条件。

然而，历代书画理论名著，仍是当代艺术研究者、爱好者不可绕过、需要反复研读、借鉴的经典。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是因为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尤其是那些重大的具有原创性、奠基性的文献，它们传承了民族的思想文化精要，因此具有更加高标的价值和意义。同时，经典又具有常读常新的魅力和启示作用，历史证明，经典允许被不断阐释，经典在被阐释中愈加能显示出经典的价值。

为了让书画理论经典在当代读者中产生新的影响，我社特推出“经典重读”丛书，拟选择历代书论画论中的代表性著述，邀请当代相关研究专家，以古今为视野，熔各派观念为一炉，以当今学术为手段，借鉴现代阐释方式，对经典名著加以全新的解读。它们可以是对原著系统、详尽、独到的解析，也可能含浓郁的个人学风或独特学术观点，有的则可能与原著之思维理路相碰撞——古今论点的交合与对立也不妨，以期为学术界、创作界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基于此，则本丛书的目的并非炒冷饭，而实属启新篇。

上海书画出版社

# 前 言

李廷华

碑学概念之提出对中国书法风格分判的意义；  
清代学术隐含人心思变之幽微；  
阮元首倡碑学之贡献及偏颇；  
《广艺舟双楫》问世前后，叶昌炽等学者的不同表述；  
梁启超对自己及康有为学术之反思。

中国书法艺术在长期发展之中，形成丰富的风格面貌，然不同风格之分判依据含混模糊，其与中国文化学术之涵茫特色趋同。书家染翰终生，风格亦多变化，鲜有终身一体不变者，恒多诸体同操者。强分流别，每自扞格。故古人论书，多以书家之具体特色为说，若“二王”，若“颜柳”，若“宋四家”，若“赵董”。又多以时代风格之趋近者归擘门派，具体则多研寻于笔法章法之变化异同。及于清代，历史之积累愈见纷繁，学术之探析亦愈深细，兼斧钺森严，文网密布，若唐宋时代之性情张扬，士大夫欲与帝王共治天下之风气消杀，文人心性于长期禁锢钳制中，发抒胸臆每不能，书斋生涯且长久，遂多沉潜为前代学术之梳理，以致考据之学大兴。此实社会环境外因及学术发展“内在理路”之湊泊也。余英时在提出“内在理路”说之时，亦申说：“历史上任何一方面的重大变动，其造因都是极其复杂；而且迄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试图将历史变动纳入一个整齐系统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

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必须指出,这种‘自主性’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学术思想的动向随时随地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sup>[1]</sup>。《广艺舟双楫》在乾、嘉考据之学大行而衰飒之际问世,既为斯学之反叛,亦堪为殿军。云其反叛,乃南海之说已脱略考据而受外在环境影响至巨;云其殿军,乃毕竟依附有清一代考古文物发现甚多而小学繁盛之风潮。其功首在对中国书法风格学之揭橥,与西方论美学风格必以“壮美”“秀美”二者之对应为衡量,以趋于现代美学思维。学术之筚路蓝缕,每由粗入精,由宏至微,先朦胧后明晰,先大概后具体也。顾炎武、黄宗羲由明入清,以思想家而沉潜学术,各有《金石文字记》及《金石要例》刊布,然二著虽开有清金石学之先路,于书法观念无涉,亦不预于书法风格之学。以雄强秀弱之两极而倡论书法,最先者为经学考据大家阮元(1764—1849)。言碑帖之先,阮元于金石学已多有建白,其《积古斋藏器目》《山左金石志》等均为以金石碑版考论书法之滥觞。至《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出,则以地域划分书法风格,将碑帖判断风格两造遽成醒豁。书法艺术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脉,早于书法而就纷繁复杂之创作现象及作品面貌探寻美学观念,辨析不同风格,欲为浑茫幽深之中华文化分判泾渭,以文学为先。《世说新语·文学》有谓:“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sup>[2]</sup>又若《隋书·文学传序》:“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在地域隔绝、交通不畅之时代,以南北地域人群之不同划分文学源流,虽不免牵强,亦有其因由,及至近世,南北交通辐辏,人群迁徙频繁,以地域强分文化艺术风格,则更显支绌。钱锺书尝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sup>[3]</sup>。视中外学术亦作一统观,岂华夏之内可强分畛域焉?虽然,别裁分梳以入明细,研寻流脉以判肯綮,毕竟为学术之需要,亦学人所愿为。文学史有关唐宋诗之分,即不同前修,钱锺书所谓“诗分唐宋,人不必唐宋”,即超越前人欲探寻文化风格却自限于狭

[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页。

[2]《世说新语》文学第四,《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10页。

[3]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前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隘境地之尴尬，为风格学研究开拓通衢。惜书法学术，尚无此明晰之论也。自北宋以还，因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学术深入，金石学渐成门类，若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之先后问世，已对“碑学”起发凡之义。中历元明两代，其学未彰，而至有清，则随考据学而大兴。阮元身当乾嘉考据之世，又为朝廷文教重臣，二论肇始，风靡南北，其后之何绍基（1799—1873）以卓越书才，绍继其学，亦有《东洲草堂金石跋》《东洲草堂金石诗》，其书作亦显然尊碑。然何氏终以自省之心，研习之验，不能堕于一偏。与其同时又有包世臣撰《艺舟双楫》，较阮氏虽云尊碑又拟调和南北书派更趋激烈，兼以邓石如书绍秦汉篆隶，与馆阁帖札异趣，亦不类康熙、乾隆尊崇之董其昌、赵孟頫一路典雅流丽之属，实蕴涵人心思变之幽微。中国文化之变异，每在自身血脉中寻觅资源，故尊碑之风，舍帖札而崇篆籀分隶，实复古之意也。康有为之《广艺舟双楫》则为扬碑抑帖之甚者。阮元、包世臣均擅文名，各具影响，殆未若康有为以变法为号召，领百年之风气，故其《广艺舟双楫》一出，即与其变法领袖之身份形影相随。欲于书法一道得风气之变者，无不推崇南海，以致言书学以不崇北碑为卑，亦若乾、嘉间言学术以不谙考据为陋。至清朝覆灭，民国代兴，旧学诸端多蒙遗老遗少之讥，民间草野遽成新潮新颖之样。康氏虽以保皇成余孽，其学则更兼时会，因变法诸人皆未若康氏有此专论书法之著也；且变法诸人，虽多文采，均未若康氏文章变幻斑斓之眩目也。综观康氏上太后、皇帝诸书，其能以一落第秀才之微，终居鼓荡风潮引领时流之要，以其文章之痛切慷慨际遇时世之风雨飘摇也。然以中国书法发展之悠远，风格分判之复杂，又非慷慨痛切之登高一呼可以涵盖其浩茫，故云康氏之文章风华绚烂可，谓其为鞭辟入理之学则非也。当康氏之说风靡之倾，即有江西学者欧阳辅（1861—1939），亦搜罗历代书法典籍为考证之学，对于金石学中之幽微，颇具只眼，在其《集古求真》序言中云：“金石之学，至国朝而极盛。金石之书，亦以国朝而至繁，然其精诣殊少，谬误孔多。有读之终卷，竟无一语可取者，有阅之令人喷饭者。……如康有为之鼎鼎大名，《广艺舟双楫》炫博市奇，实则放诞矛盾，不胜指摘。其他纯盗虚声，实繁有徒。求其具有门径，大致不差者，已不数见。求其考核精当，不愧名家者，前唯覃溪、潜研、兰泉、虚谷诸老，



近唯鞠裳叶先生一人，且应后来居上。”<sup>[4]</sup> 欧阳氏所云鞠裳叶先生，即长洲叶昌炽（1849—1917），为康南海同时代人，以二十年访求之劳，积八千通碑拓之富，经十载伏案之功，撰成《语石》十卷。梁启超阅读《语石》之后评价云“颇集诸派之长”，又谓“独出己意，有近世科学之精神，可以名世矣”<sup>[5]</sup>。梁启超为南海弟子，然于金石考证之学却心仪叶氏，即因《语石》乃真具学术内涵及科学精神之书。叶氏之撰作，即凝聚心血学养，致力碑学之考订整理，探幽索微，规摹发凡，为真正继承乾、嘉考据学之精神者。现代学者胡文辉论道：“在有清廷仕宦经历的近世学人群体中，叶氏官不甚显，名不甚著；但他能专心，善著书，论传世的成绩，较之王闳运、王先谦、缪荃孙、沈曾植、柯劭忞诸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文献学而言，同时代人惟叶德辉可相匹敌，如缪荃孙、傅增湘等皆乏条理，论著述皆不及也。叶氏所著，以《藏书纪事诗》《语石》最为不朽。曹元弼称‘两书皆独有千古’，吴郁生更谓：‘余谓著书难，本朝嘉道后人则更难。独君之《藏书纪事诗》《语石》二编，乃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sup>[6]</sup> 曹氏为江南大儒，著作等身，作育沈文倬、王遽常、钱仲联、唐兰等诸多名家；吴氏乃康有为座师，亦为书家，对南海之作当亦熟稔，亦因南海牵连而去职。惟其如此，在比较中推崇《语石》，亦可见学术公器，终必在辨难与辨析统一中而成公论。

综观清代以来碑学诸论，阮元、包世臣、叶昌炽、欧阳辅诸人之撰，各有千秋，均未若康有为影响之巨，且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偏颇最为显明。中国书法之风格，本于具体书家及作品之现实存在。辨析其美学意蕴，还当本实事求是之心，得见微知著之效。本文以康著每卷为序（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所选《广艺舟双楫》），引证各家之论，兼抒一己之臆，以就教于当今书法学术同好。

[4] 欧阳辅《集古求真》，江西开智书局，1921年石印本序言。

[5] 梁启超《书籍跋·叶鞠裳语石》，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卷四十四下。

[6] 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一、叙目·····	1
二、原书第一·····	7
三、尊碑第二·····	17
四、购碑第三·····	25
五、体变第四·····	37
六、分变第五·····	45
七、说分第六·····	55
八、本汉第七·····	65
九、传卫第八·····	75
十、宝南第九·····	83
十一、备魏第十·····	89
十二、取隋第十一·····	95
十三、卑唐第十二·····	101
十四、体系第十三·····	111
十五、导源第十四·····	121

十六、十家第十五 .....	127
十七、十六宗第十六 .....	135
十八、碑品第十七 .....	141
十九、碑评第十八 .....	147
二十、余论第十九 .....	153
二十一、执笔第二十 .....	161
二十二、缀法第二十一 .....	169
二十三、学叙第二十二 .....	179
二十四、述学第二十三 .....	185
二十五、榜书第二十四 .....	191
二十六、行草第二十五 .....	199
二十七、干禄第二十六 .....	205
二十八、论书绝句第二十七 .....	215
结 语 .....	223
参考书目 .....	229
附 记 .....	231

## 一、叙目

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则刻镂其精，冥察其形为之也。不劬于圣道、王制、人理、物变，魁儒勿道也。康子戊、己之际，旅京师，渊渊然忧，惛惛然思，俯揽万极，塞钝勿施，格绌于时，握发憇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大道藏于房，小技鸣于堂，高义伏于床，巧爨显于乡。标枝高则陨风，累石危则坠墙。东海之鳖，不可入于井；龙伯的人，不可钓于塘。汝负畏垒之材，取桀杙，取檐椽，安器汝。汝不自克以程于穷，固宜哉！且汝为人太多，而为己太少，徇于外有，而不反于内虚，其亦闾于大道哉！夫道无小无大，无有有无。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蟪蛄之巢蚊睫，蟪蛄之睫，又有巢者，视虱如轮，轮之中，虱复傅缘焉。三尺之画，七日游不能尽其蹊径也。拳石之山，丘壑岩峦，窈深窟曲，蟻螻蚋生，蛙螟之衣，蒙茸茂焉。一滴之水，容四大海，洲岛烟立，鱼龙波谲，出日没月。方丈之室，有百千亿狮子广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反汝虚室，游心微密，甚多国士，人民丰实，礼乐黼黻，草木茏郁，汝神禪其中，弟靡其侧，复何惊哉！盍黔汝志，锄汝心，息之以阴，藏之无用之地以陆沉。山林之中，钟鼓陈焉，寂寞之野，时闻雷声。且无用者，又有用也。不龟手之药，既以治国矣。杀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皆安焉。苏援一技而入微者，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

于是康子翻然捐弃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却扫，摊碑搞书，弄翰飞素，千碑百记，钩午是富。发先识之覆疑，窍后生之宦奥，足无用于时者之假物之游

戏莫也。国朝多言金石，寡论书者，惟泾县包氏，辄之扬之。今则孳之衍之，凡为二十七篇。篇名如左：

原书第一 尊碑第二 购碑第三 体变第四  
分变第五 说分第六 本汉第七 传卫第八  
宝南第九 备魏第十 取隋第十一 卑唐第十二  
体系第十三 导源第十四 十家第十五 十六宗第十六  
碑品第十七 碑评第十八 余论第十九 执笔第二十  
缀法第二十一 学叙第二十二 述学第二十三 榜书第二十四  
行草第二十五 干禄第二十六 论书绝句第二十七

永惟作始于戊子之腊，实购碑于宣武城南南海馆之汗漫舫。老树僵石，证我古墨焉。归欤于己丑之腊，乃理旧稿于西樵山北银塘乡之澹如楼。长松败柳，侍我草《玄》焉。凡十七日至除夕述书讫，光绪十五年也。述书者，西樵山人康祖诒长素父也。

## 【辨析】

清初顾炎武与清末康有为所处社会环境及治学态度之不同；

梁启超谓撰文修史最忌三病：夸大，附会，武断；衡诸南海之书，三病俱在；

梁启超在反思中与乃师学术思想之分道扬镳；

《广艺舟双楫》成书时沈曾植、黄绍箕的赞助及其后之不同意见；

钱基博谓康有为“强不知以为知”“夸诞其词”。

《广艺舟双楫》之序目开宗明义云：“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则刻镂其精，冥繅其形为之也。不劬于圣道、王制、人理、物变，魁儒勿道也。”南海又云：“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螭螟之巢蚊睫，螭螟之睫，又有巢者，视虱如轮，轮之中，虱复傅缘焉。”此说与素来谓书法乃小道雕虫者异趣，颇可以为崇扬书法乃“中华文化核心之核心”之论张帜。比较前贤，若苏东坡以为书法乃事业学问之余事，黄道周更谓书法乃学问外“七八等事”，康氏于书法之热衷岂不远迈前贤乎？然康之论书，本与其政治谋划有关，非为纯学术也。南海云：“且无用者，又有用也。不龟手之药，既以治国矣。杀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皆安焉。苏援一技而入微者，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此即可见其尊碑抑帖，非为书法，实为其颠覆前修以书法之变法为己之“素王”事业立则也。其论书乃论政之余绪，长处在世事洞达中辨析书法之去马来牛，具文化社会学之价值；谬悖在以六经注我，未凑书艺之单微，更兼示例率意，前后冲突，子盾子矛，自相攻伐；使书法传统中本来明白之道理又陷混淆，本可渐趋明晰之现象复入朦胧。百年以来，虽有诸多反驳，然其莫衷一是之论，加于书坛似是而非之说，仍为悖论叠出之渊薮，此乃不得不为之辩也。

辨析之先，拟将有清一代学术云其大概。康有为可谓清末学术之殿军，上朔之，则顾炎武可谓有清学术之先冠。南海身当清季末世，其成长环境与二百多年前处明、清易代之顾炎武恰可作一对比。顾炎武之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为后世崇拜，其人在国家沦亡之际，曾亲身参与抵抗强敌之战争，在明白抵抗无望之后，遂潜心学术，倡扬“以考据为义理”，其所撰《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

实开有清三百年学术之先河。顾氏自道积数十年而成之《日知录》云：“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昆山之政治抱负，岂亚于南海？然就学言学，则真学也。康有为之世，乾、嘉考据之学已为强弩之末，“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之悠然确凿与世事风撩火急之煽惑招引，洵难为同日之语。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之前，于书法并无深研。渠自广东赴北京应顺天乡试落第，遂上书光绪皇帝求变法而受守旧官僚攻击，蛰居北京宣武门外之南海会馆谋进阶，居处临近琉璃厂，闲中淘购碑版杂书，遂以一年时间，于辗转北京、广东间完成《广艺舟双楫》。据康氏自述，此书之正式命笔，在己丑之腊月，以十七日之功而毕，杀青之日，已在除夕。次年，康氏乃在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等多人协助下开始撰著《新学伪经考》。《广艺舟双楫》实撰作于《新学伪经考》之前。康有为早期撰作，多得梁启超赞助，然师徒因性情心理之不同，于纷繁人世之变幻中终分道扬镳。盖康有为一生以“素王”“魁儒”自命，大言煌煌，颐指气使，胸胆开张而肌理枯萎，强词夺理复乖谬显然，又绝少反求诸己之诚，终落自相矛盾之谬。梁启超则具修辞立诚初心，随时代发展进步，渠于1925年在清华为国学讲授，即针对脱离客观之学术现象云：“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揆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俱伤。”<sup>[1]</sup>此为梁启超一生学术澹定之论。渠早年受康有为影响，笔端感情饱满而于事实考据不甚讲求，至晚则服膺乾、嘉，其云：“思想批评必须建设于实事的基础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sup>[2]</sup>梁启超作为康有为变法思想之参与者，充分肯定康有为运用今文经学的思路和方法鼓吹变法、倡导改革的历史功绩，称《新学伪经考》“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同时，他又于《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白指出康有为学术思想之局限：“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2]同上，第119页。

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其对自己也能一分为二，尝云：“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轻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不带成见的反思及与自我为敌之意念，促成梁启超以后对学术的深入研寻。梁启超并非甘于考据之学，然而非实事难以求是，欲得明晰之判断，须先明了事实之真伪。其云：“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取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吾侪今日宜筚路蓝缕以辟此途，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且为后人作计，舍踵吾业者，从此得节蓄其精力于考证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sup>[3]</sup>其所论，于自我反思中亦可视为对乃师之批评。康、梁既分手，梁启超亦于《清代学术概论》中总括而论云：“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治学而治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惜康有为毕生未有此反思之论。梁启超谈及清代考据学之发达，与元代戏曲发达为比较云：“元代剧曲最发达，清代考证学最发达，两者之方向，可谓绝异；然其对于政治问题之冷淡则同，较之汉、唐、宋、明四代之士风截然矣。吾侪因此可得一假说，谓在异族统治之下，人民必惮谈政治也。”<sup>[4]</sup>梁启超谓撰文修史最忌三病：夸大，附会，武断。衡之南海之书，三病俱在焉。金石学乃乾隆、嘉庆考据之附丽，因金石而出碑学，是其衍续也。清人若钱晓徵、叶昌炽之论，皆考据金石碑版，而于书法论列非多；阮元之《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于书法流派自分畦町，已启扬碑之序，包世臣撰《艺舟双楫》，更张非帖之帜。南海广其义而论艺，颇有续其前修之雅，然独张“卑唐”之目，则阮仪征、包安吴之莫敢焉。南海谓“国朝多言金石，寡论书者”，即以乾嘉考据为烜灼，必欲作携卷登山之唱。当其时也，国势渐蹙渐危，士心思离思变，南海以改弦更张之想，欲奏一药百施之功，致有其十七日之书焉。渠以宏才巨手，少年心胸，开一代之僂论，百年之后，吾侪于文化澹定之倾，回观往史，当汇综源流，探析幽微，是其所真是，非其所实非，以俾书道之正论，直凑艺术之真髓。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9页。

[4]同上，第131页。



关于《广艺舟双楫》之成书，嘉兴沈曾植与瑞安黄绍箕所起作用非小。沈氏为显宦大家，著论辉煌。黄绍箕亦多可称道，渠比康有为年仅长四岁，却科场顺遂，南海蛰居宣武门外之倾，瑞安已居翰林，且于康氏之变法思想大为举赞，联络南海与翁同龢，即此黄公。南海初次上书未达而致噓纷纷，颇具落荒之态，亦瑞安百计抚慰。南海撰作《广艺舟双楫》之初，黄即得观，二人于变法大计多相契，然及于书法考论，则多不侔。黄氏后从梁鼎芬处得《广艺舟双楫》写本，为批注七十余则，多纠正其偏颇，而康在《广艺舟双楫》中论《苏慈碑》，亦曾言及黄氏。据王守民之《从清黄绍箕〈广艺舟双楫评注〉看其与康有为书学观之异同》一文<sup>[5]</sup>，知黄批注现存于温州博物馆。黄氏之基本观点，尊碑而不否帖，且就诸多细节与康氏切磋。倘黄氏稿本得全文刊布，亦可证南海之论发表当时，亲近者亦不甘雷同也。

钱基博于1932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以讲义纂成《现代中国文学史》，且将稿本当面请内容涉及之康有为等人过目。其在《广艺舟双楫》序目编之后写道：“有为论书绝精，顾强不知以为知，夸诞其词；所作又不能称是；而转折多圆笔，六朝转笔无圆者；倘所谓‘吾眼有神，吾腕有鬼’（《广艺舟双楫·述学篇》语），不足以副之欤？有为固自知矣。”<sup>[6]</sup>云康氏书法高低，与其理论之正误，可分别而论。康氏书法之“圆笔”，本取法《瘞鹤铭》，倘以陶弘景所书为定论，则亦在“六朝”之中。故钱氏之说，尚可斟酌，然南海圆笔，与其张扬之北碑诸什诚非一炉，则可见焉。钱基博将《广艺舟双楫》付诸文学作品而论之，兼涉书法，谓其“强不知以为知”，又谓其“固知之矣”。康氏之“夸”而“诞”，则可观其全篇而渐了然焉！

[5]王守民《从清黄绍箕〈广艺舟双楫评注〉看其与康有为书学观之异同》，《书法导报》2014年2月5日。

[6]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页。